

# 中国语源学史

殷寄明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我国汉语语源学历史的填补空白之作。书中以大量的语言事实论证了汉语语源学的起源之早为世界之最。并认为：汉语语源学的古今演变经历了八个阶段，其中汉、宋、清代和当代是四个高峰期；晚近时期是汉语语源学的一道分水岭，此前的语源学为传统语源学，声训、语转说、右文说三大语源学流派从囫囵浑一到陆续分离独立，最后又殊途同归走向合流，是其主要发展脉络，晚近以来的语源学则为科学语源学；当代的语源学已处在学科独立的前夜；自古而今，至少有 140 人为汉语语源学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 维护我国词源字源研究的尊严

（代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伍铁平

1999年8月1日至3日在长春召开了我国首届汉语词源学术研讨会。我国当代研究汉语词源学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宁教授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当然也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她在1999年8月24日的《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了专论《汉语词源学将在21世纪有巨大发展——首届汉语词源学术研讨会述评》，对这次会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时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主任的殷寄明副教授（我坚信，这个“副”字很快会被去掉）参加了会议，在整个会议过程中是发言最积极的一位学者，给了我深刻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末，我忝列为殷的师兄任继昉（二人均曾为杭州大学资深教授蒋礼鸿先生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汉语语源学》（后于1992年在重庆出版）的评审人，赴杭州参加全国语言学会并应邀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做了一次学术报告，结识了寄明同志。1998年他出版了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汉语语源义初探》，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严修教授（1934—）作序；2000年他又出版了《语源学概论》，由曾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的资深教授胡裕树先生（1918—2001年）作序。有这样一个背景，当寄明同志约我写本书的序时，我尽管两次谢绝，就不好再坚持己见了。

我谢绝的理由是我的专业是理论语言学，虽然写过一些词源学方面的论文（部分目录见上引任继昉的专著），但侧重理论及汉语和外语的词源比较，从未专门研究过汉语词源和汉语词源学史，担心捉襟见肘。我终于应允的原因是当1995年一个冒充教授和研究员、自封为“著名语言文字学专家”、自吹自擂、称其“论著代表当代语言文

字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的学术骗子徐德江在我如实地写文章称他为“学术骗子”时，竟然将我告上法庭，要我和发表拙文的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赔偿他的所谓“名誉损失”20万元巨款。这种恶人先告状，带有敲诈勒索性质的起诉，激起了中外708位语言文字学工作者的无比愤怒，纷纷发表公开信或在公开信上签名支持我<sup>①</sup>。时任复旦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寄明同志在资深教授胡裕树、许宝华（1933-）和严修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征得该系19位教师在吕叔湘、周有光、张志公、王均等老一辈语言文字学家领衔发表的公开信《语文工作者有责任对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判》<sup>②</sup>上签名。胡裕树和许宝华先生还于1996年4月10日单独发表了公开信，称“徐德江……从学术上讲有什么名誉可言呢？可以说早已名誉扫地。他的所作所为在语言学界造成的坏印象之一，是为人为学缺乏诚实的态度”<sup>③</sup>。我在此提到这段往事，一则是为了深刻悼念于2001年11月27日因病谢世的胡裕树先生，二则是为了说明我写此序是为了感谢寄明等复旦同仁的签名，三则是因为语言学界的这场打假斗争不仅涉及维护理论语言学的尊严，也涉及维护汉语词源学和字源学的尊严。寄明同志这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谈到当代语源学时尚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有义务为这一段历史提供一些材料，以便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661-723）著《史通》，提倡撰写历史著作要“不掩恶，不属善”，要“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写历史必须包括正反两面，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教训，起到启迪后人的作

① 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见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97年第1版，1998年第二次印刷）的“重印后记”，于全有作《学术界究竟有没有“骗子”——对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的回顾与反思》（刊《学术界》2000年第1期）和杨宗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刊王均主编《语文现代化论丛》第三辑，语文出版社，1997年。

③ 全信刊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语言理论教研室编《语文简讯附件》，1996年8月16日。

用。寄明同志就是这样的。他根据我国古代历史学家关于写史要有才、学、识、德的教导，既高度肯定我国历史上探讨过词源的人的巨大贡献，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例如该书第四章第一节的题目是“王安石、陆佃的语源谬论”。非常遗憾的是王安石（1021 - 1086）和他的学生陆佃（1042 - 1102）<sup>①</sup> 故去后九百余年的今天，安子介却不仅一字不改地重复他们的谬论，而且比他们走得更远<sup>②</sup>，出版了错误百出的《劈文切字集》、《解开汉字之谜》等著作；后者的英文本共五册（3244页），“在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及国内各地均有出售”<sup>③</sup>。例如，清代王筠（1784 - 1845）在其《说文例释》中早已指

① 应该将他们二人有关字源和词源的谬论同王安石作为政治改革家和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治与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陆佃的高尚人品（见郭松民《陆佃的品格》，刊1994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严格区别开来。

② 例如，众所周知，王安石在其《字说》中称“坡者土之皮也”，遭到了苏东坡的讥讽，说照此推论，“潯者水之骨也”。王说从此成了千古笑柄。但是安子介居然在其《劈文切字集》（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第167 - 168页上不仅变相地重复王的谬论，说“‘坡’……似人体之‘皮’”，而且肆意发挥，说“‘波’字意：江海水（冫）之‘皮’”；连众所周知的借自巴利语的译音词“玻璃”（曾音译为“颇梨”“颇黎”等）的无意义的音节“玻”也被安解释为：“字意：有物薄如‘皮’，其值（发明当时）如玉”。“菠菜”古时曾称“波棱”菜，是波斯语 *aspānāh*（菠菜）的不准确的音译借词\*（德语、英语和俄语也都有此借词：Spinat, spinach *шпинат*），后来“简作“菠菜”。可见“波（菠）”是个无意义的音节。但是安却“妙笔生辉”，居然说“‘菠’字意‘波’斯来之植物”。“波斯”的原文是 *Persia*，与 *aspānāh*, *Spain*, *Palinga* 毫无关联。

\* 见尚斯基等编的《俄语简明词源词典》（莫斯科，1965年）第512页，C.T. Onions 主编的《牛津英语词源词典》（1982）第854页上说，此词可能来源于“西班牙”（Spain）；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第48页上说，汉语中的此词可能来源于尼泊尔的古名 *Palinga*（波陵国）。

③ 见安子介著《劈文切字集》封四，香港瑞福有限公司，1987年。这书名本身表明作者缺乏汉语言文字学的基础知识，因为段玉裁（1735 - 1815）早就指出过，独体为文，如“日”、“月”等，合体为字，如“好”、“明”等，因此文是不能劈开来分析其字源的。许慎将他的字典叫做《说文解字》。安子介用“劈”代“说”，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出，“鸭”是拟声词<sup>①</sup>章太炎（1869—1936）在其《语言缘起说》中也说明了“鸡”“鸭”“鹅”等都是拟声词。王宁在其《训诂学原理》（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第293页上从古音上论证了“鸡”“鸭”“鹅”都是得名于它们的鸣叫声。其实，英语的 chicken、荷兰语的 kuiken，德语的 Küchlein，俄语的 кyp（意义分别是“小鸡”、“公鸡”）；英语的 goose，德语的 Gans，俄语的 гycb（意义都是“鹅”）的词根都是拟声。稍为有点语言学常识的人都知识，这是许多语言共有的一种普遍现象（universals）。但是，被其吹鼓手吹嘘为“精通英、法、德、西班牙、日等多种文字”<sup>②</sup>的安子介却既不看我国古人的语文学著作，也不看我国近代和当代语言文字学家的著作，也不了解在语言学界早有定论的某些语言普遍现象，居然将“鹅”的字源和词源解释为“为了表现‘我’，总是高高抬着头的一种‘鸟’”。安把所有带“我”字旁的字，除个别字外，都解释为含有“我”意；如“饿”是“我没有食物”（不如“没有”的意义从何而来）；“娥”是“‘我’赞美的‘女子’”（别人赞美不行吗？）；“俄”是“‘我’”和这个‘人’”。他还把“俄罗斯”说成是“В России 的谐音，把‘在俄罗斯’一词中的‘在’字也译了进去”。其实，“俄罗斯”是蒙古语 Oros 的音译词，这儿的 B 在俄语中读作 [v]，根本不读作“俄”。安还把拟声叹词“哦”解释为“你（别人说不行吗？）‘口’说，‘我’听到”（意：“我[别人‘领会’不行吗？]知道

① 寄明同志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从“事自名”谈到“其名（鸣）自呼”时，引了唐宋时代作者的言论，指出一些动物的名称是人们根据它们的鸣叫声赋予的。

② 见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李在这儿混淆了语言和文字。英、法、德、西语使用的是一种字母；拉丁字母。徐德江等在《汉字文化》上曾不断吹嘘“安子介精通八国文字”。李在上引《汉字哲学初探》第190页吹捧安“先后涉猎了八国语言，并能应用演讲”。

了?)。① 安子介这些所谓创新真是想入非非，离科学的词源学和字源学② 十万八千里，不用我们解释，读者便会知其荒唐。安子介对其他许多汉字的解释也是错误的。他说英语的 swallow（燕子）同汉语的“燕（子）”都是从“吞咽食物”得名。安还说“老英语”是“凯尔特语”“混合语”③。这些都是错误的。

我国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王鸣盛（1722—1797）在其《十七史商榷·序》中说过：“好著书不如多读书……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这话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安子介关于汉字字源的许多谬论来源于他的错误“理论”。他说：“我发现了所谓‘声旁’事实上都是有意义的、可理解的”。于是他得出结论：“我们有必要把每个汉字拆开来看，使它逻辑化、观念化”④ 他不知道，古人称为“文”的许多独体字是不能拆开的。即使是那些可以拆开分析的古人称之为“字”的合体字，也必须根据古人造字的原来的意图进行科学的分析，不能任意地由安个人使它逻辑化、观念化（这两个术语涵义不明，姑置不论）。

对安子介的种种奇谈怪论陈炜湛教授在其精彩的论文《〈昭雪汉

① 见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上册，112，118—120页，并见《安子介语文学术思想（？）研讨会文集》第10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汉字文化》第4期第34页。

② 汉语中的词源和字源是两回事，前者研究的是最初造词时其音义结合的依据，后者研究的是古人造字的依据，尽管二者有时吻合。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阐释见拙文《论词源学及其意义和研究对象》，刊《外语学刊》1986年第4期。安子介经常将词源与字源混为一谈。

③ 安话的出处和我对这些错误的批评见拙文《不要玷污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评李敏生的〈汉字哲学初探〉》（刊《北方论丛》2002年第1期）和拙文《违背历史事实的例证——初评〈汉字哲学初探〉》（刊《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 见李敏生和李涛《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3页；并见安子介《劈文切字集》第78页和《汉字文化》1991年第4期第33页温端政文《试论安子介先生的“声旁有义说”》。

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评析》<sup>①</sup>中已进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深刻的批评，陈文并且列举了吕叔湘和邢公畹两位我国一流语言学家以及苏培成等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和教师从1990年开始发表的16篇文章（其中吕叔湘发表了两篇<sup>②</sup>），批评安子介的谬论。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186、203、246、260、363—366页也批评了安的许多错误观点。遗憾的是徐德江不顾这些有理有据的批评，竟然在他控制的刊物《汉字文化》1996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吹捧“安子介解开汉字千古之谜”“袁氏（指袁晓园）汉语学（？）、安氏汉字学（？）、申（指申小龙）氏文化语言学（？）、徐氏（指徐德江）普通语言学（？）……开拓了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向新阶段的跨越”。李每生在上引《汉字哲学初探》第179页上说：“安子介在这逾五百万字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创立了全面的、系统的、崭新的汉字科学体系（？）。安子介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的优良传统（？），突破了西方语言学一百年来强加给中国语文界的种种僵化模式（？）……把中国汉字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水平（？）。”李每生还在上引《昭雪汉字百年冤案—安子介汉字科学体系》（印了一万册，可见流传很广）第12页上说：“中华民族能有安子介这样具有超常的外语知识（？）、深厚的汉字功底（？）和为振兴中华无私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精英，值得我们庆幸和骄傲（？）”。李涛在其《当代汉字学的奠基者，昭雪汉字冤案的第一人》（刊《汉字文化》1993年第4期）对安子介的吹捧更是令人感到肉麻。他说：“安子介……在汉字学术史上引发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学术革命。安子介先生实至名归成为中国当代

① 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1998年12月8日和22日的《中国教育报》连载。

② 因此，安子介在袁晓园主编的《21世纪：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安子介语文学术思想评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4页上说他的“汉语学习新法……吕叔湘……教育已给予好评”，完全不符合事实，何况上述提法中安再次混淆了语言和文字，因为他并没有提出“汉语学习新法”，而只是涉及汉字。

汉字学的奠基者。……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需要理论指导，……这个历史任务，便由一个非语文专业的中国人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他就是香港大学问家(?)安子介先生，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大智(?)大仁大勇”。(以上引语中的问号都是我加的一伍)。

李涛说此话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在他眼里，我国大陆那么多真正的语言文字工作者都只会盲目的实践，只有安子介才能对他们进行理论指导。

类似的言论在《汉字文化》中比比皆是。仅仅将上面列举的这些谰言媚语同上面我们所列举的安氏的谬论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几个“傍大腕”“造神”的人究竟要达到什么个人目的。

安子介一开始还是认为他的那些任意分解汉字的方法只是为了便利外国人学习汉字(见《劈文切字集·自序》)。这从上面注①他所说的“汉语(实指汉字)学习新法”也可以看出。他的英文著作《Cracking the Chinese Puzzles》(解开汉字之谜)<sup>①</sup>的中文名称是“汉语学习”(实指“汉字学习”，安在此再次混淆汉语和汉字)也证明了这一点。记得我们小时候用“汉口起火”帮助记忆英语的 handkerchief(手帕)。安子介的任意分析汉字的方法同上述方法一样，也许在教学上有点用途，却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然而当徐德江、李敏生、李涛等人把安想出的记忆汉字的手段捧上了天时，安却似乎忘记了他撰写《学习汉语》的初衷，完全同意他们对他的上述吹捧，因为根据《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的作者之一李敏生为该书写的“前言”我们得知，该书初稿曾经安子介阅读过，对该书作者李敏生和李涛“所持的观点不作任何修改”；李敏生在《汉字哲学初探》的“后记”中说，该书“在近十年的写作过程中，曾就许多问题向安子介……求教”。据此我

① 这书名说明安子介缺乏应有的谦虚态度。仅从我国第一部含有解释字源内容的字典许慎(58? - 147?)编的《说文解字》和带有词源词典性质的刘熙编的《释名》开始，探讨汉字字源和汉语词源的著述汗牛充栋，怎么可以说汉字之谜要靠安子介去解开呢?!

们有理由推断，安子介对他们向他所作的上述吹捧是认可的。

我们进一步批评安子介关于汉字字源的谬论，绝不等于我们改变了我们在上引《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364页上所说的对安子介的“爱国主义热情和从事汉字教学的刻苦钻研精神”的肯定。安子介生前是我国的重要统战对象，对这一事实我们至今予以充分肯定。但是政治上可以进行统战，学术上却是只问是非的。再大的名人也不应该，而且不可能用他的名声掩盖他学术上的错误，何况越是有名，他的谬误的影响可能越广，给人的误导越加严重。据李涛说，“仅仅两年半时间，安子介学说在大陆已成星火燎原之势。不少学校用来指导集中识字教学，有的学校用来指导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汉文，有的幼儿班用来指导儿童识认汉字，都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sup>①</sup>我们不知道李的说法是否属实，也不知道现在是否仍这样；如果真是这样，不知有多少可怜的学生上当受骗，对汉字的构成和语言文字学理论形成完全错误的认识。因此，本着对历史和后代负责的态度，我们撰写了这一“代序”，并且希望寄明同志在再版这本我国的第一部专门探讨词源学史的著作时，能加写一章，全面评述安子介对汉字字源的说解（其中有少数他说对了）和我国学术界对他的批评。美国汉学家V. Mair（自取中文名“梅维恒”）教授曾亲口对我说，他看到世界许多书店都出售安子介的《解开汉字之谜》的英文本。我在北京一些宾馆的售书亭、我国和外国的一些大机场候机厅的售书处也看到过安的书，因为这是迄今唯一的一部用英文写的解释汉字字源的“巨著”。安子介借助他雄厚的经济势力及香港同世界各地的广泛联系，几乎垄断了有关汉字字源的国外书籍市场，这对有着悠久字源和词源研究历史（从许慎算起，将近两千年）的我泱泱大国来说，真可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连梅维恒这样一位懂得一些汉语字源和词源的美国汉

<sup>①</sup> 见李涛：《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论安子介学说的社会效益》，刊《汉字文化》1990年第3期第21页。

学家都为此感到十分焦虑，下决心邀请我国一些研究词源的学者（包括寄明同志）编写一部科学的《汉语字源词源词典》（书名未定），以取代《解开汉字之谜》，消除其不良影响。作为这项任务的前期工程，有必要指出安子介对汉字字源解释的许多谬误，因为我认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古训至今仍是完全正确并且合乎辩证法的。如果说在安子介生前做此事可能有政治上的顾虑的话，现在盖棺论定，就完全可以无所顾忌了。王安石（1021—1086）两次官居宰相高位，他的同时代人苏轼（1037—1101）尚且敢于讥笑王安石的字源谬论，这种不畏权势的勇气值得我们效法。难道经受过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精神洗礼的我国知识分子连苏轼都不如吗？！我希望寄明同志在他的书再版时加写这样一章，因为他对王力这样的我国语文学界数一数二的大权威也敢于在高度肯定王力的《同源字典》是一座丰碑的同时，有理有据地指出了该书的一些失误<sup>①</sup>。当然，无论是加写这样一章或编写《汉字字源字典》和《汉语同源词典》，都绝非易事。要考查一个汉字的字源，经常要从甲骨文（如果见于其中的话）找到隶书，查许多古籍；要确定汉语中一个词的词源，如果它来源于原始汉藏语的话，还需要查找汉语的各种亲属语言，而绝不可能像安子介那样，“想上两三天，最后得到解答”<sup>②</sup>。许多字源和词源至今还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批评别人在这方面的错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要确定一个汉字字源和词源，就要困难得多。作为第一步，不妨先编《常用汉字字源字典》和《常用汉语词源词典》，收进有定论的字源和词源，因为正如苏联词源学权威瓦·伊·阿巴耶夫（1900—？）所说，词源词

<sup>①</sup> 见殷寄明《同源字典笺识》，刊《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1期，并见本书中寄明同志有关王力的章节。

<sup>②</sup> 见上引安子介《劈文切字集》第29页。李敏生和李涛在上引《昭雪汉字百年冤案》第83页吹捧“安子介……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对‘部首’外的‘声旁’逐一进行研究（？），终于解开了全部（？）‘声旁’之谜”（惊叹号和疑问号是我加的一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典“应该成为每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案头必备书”。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列·阿·布拉霍夫斯基(1888-1961)甚至认为,一个人掌握语言的程度,取决于他判断词与词之间的活的词源联系能力的高低<sup>①</sup>。我曾撰文《比较词源学及其对语言教学的意义》(刊《百科知识》1994年第5期),可见词源学及其研究,包括词源学史和词源词典都不仅是学者象牙塔中的珍品,对大众也有很大实用价值,

这正是我们呼吁维护我国词源字源研究的尊严的原因。

话说远了,现在回到寄明同志的这本书上来。按说我本应从头到尾读完他的书才有资格写序,但是出版社给我写序的时间只有20天,寄明同志只寄来部分书稿,因此我不可能对殷书作出全面的评价,而只好以此“代序”滥竽充数。但是在倡导开展学术批评的时期,每个人都要从我作起,我不应仅在代序中说殷书的优点和提出一点希望,还必须提三条够不上意见的疑问:(1)第一章的标题将先秦视为中国语源学的诞生时期是否太早?该章第一节标题是“朴素的语源学思想萌芽”则比较合适。与此有关的是该书“绪论”说汉语语源学的起源比欧洲语源学的起源早七个世纪。公认的观点是科学的词源学是十九世纪欧洲诞生历史比较方法以后才产生,中国科学的词源学是引进历史比较法以后才产生的。(2)殷书第一章第一节赞同地引章太炎的话“同一声类,其义往往相似”,并且引洪堡特的话作为佐证。刘师培也说过:“同韵之字,义必相近”<sup>②</sup>。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段注》第十一篇下也谈过“凡‘段’声皆有赤色”。其实这些说法都犯了所谓语言象征主义(sound symbolism)<sup>\*\*\*</sup>的错误,因为非派生词的音义之间并

<sup>①</sup> 两位学者言论的出处见拙文《〈教学用俄语词源词典〉序》,刊《外语学刊》1986年第1期。

<sup>②</sup> 转引自《语言研究》1982年第1期第168页。

<sup>\*\*\*</sup> 此语通译为“语音象征”。但我们在这儿用它是表明一种观点,故按原文的一个意义翻译。

无必然联系，是约定俗成的。如“虾”、“霞”、“瑕”等词的词义所指虽然都与红色有关，但“暇”“假”“遐”等词却与红色无关<sup>①</sup>。(3)在“绪论”中把研究汉语词源的三种方法：声训、右文说和音转理论说成三个流派是否恰当，尽管在第五章第二节中是称为“三种方法”。

最后还要声明一点，寄明同志的书对当代研究词源学的人都有所评论。由于我没有看到这部分书稿，无法表示是否赞同他的评价。序不等于书评，我想读者可以理解，不可能要求序的作者对全书的每一个问题都作出评论。

---

<sup>①</sup> 详见上引拙文《论词源学及其意义和研究对象》。

## 目 录

## 绪 论

- 一、中国语源学史两面观····· ( 1 )
- 二、起源之早实为世界之最····· ( 2 )
- 三、历经八个阶段四个高峰期····· ( 4 )
- 四、三个流派的嬗变即通史轨迹····· ( 5 )
- 五、古今主要人物及成就简况····· ( 9 )

## 第一章 先秦：语源学诞生

- 第一节 朴素的语源学思想萌芽····· ( 20 )
  - 一、子思“事自名”说的语源学意义····· ( 20 )
  - 二、荀子对事类名类对应律的认识····· ( 23 )
- 第二节 诸子的“名实之辨”····· ( 25 )
  - 一、引起名实之辨的社会原因····· ( 25 )
  - 二、先秦十二子的名实观····· ( 26 )
  - 三、名实之辨的语源学意义····· ( 29 )
- 第三节 各种典籍中的声训····· ( 30 )
  - 一、各种典籍中的声训举隅····· ( 31 )
  - 二、声训现象的语源学分析····· ( 33 )
- 第四节 《尔雅》中的同源词聚合····· ( 38 )
  - 一、被释词同源现象抽样分析····· ( 39 )
  - 二、同源词相训现象抽样分析····· ( 41 )

## 第二章 两汉：语源学崛起

- 第一节 语转说流派初步形成····· ( 47 )
  - 一、扬雄是语转说流派奠基者····· ( 47 )

二、许慎的“转注”亦与语转相关·····	(51)
三、郑玄的语源学功绩甚巨·····	(53)
<b>第二节 声训流派蔚为大观·····</b>	<b>(57)</b>
一、两汉小学家的声训·····	(57)
二、两汉其他人物的声训·····	(63)
<b>第三节 《释名》是右文说的近源·····</b>	<b>(73)</b>
一、右文说的基因与胚胎·····	(73)
二、《释名》对右文说的孕育之功·····	(75)
三、对《释名》声训的语音语义检验·····	(78)
<b>第三章 三国至五代：语源学递衍</b>	
<b>第一节 语转说发扬光大·····</b>	<b>(86)</b>
一、《史记》三家注中的语转说·····	(87)
二、郭璞语转理论上的发展·····	(87)
三、颜师古训诂中的语转说·····	(91)
<b>第二节 声训的沿用与改进·····</b>	<b>(93)</b>
一、薛综的《“两京赋”注》·····	(94)
二、李登的《声类》·····	(95)
三、郭璞的《方言注》、《尔雅音图》等·····	(96)
四、王肃的群经注·····	(98)
五、张揖的《广雅》·····	(99)
六、杨上善的医学典籍注·····	(101)
七、李善的《文选注》·····	(102)
八、颜师古的《汉书注》、《急就篇注》·····	(104)
九、《史记》三家注·····	(107)
<b>第三节 右文说已显露萌芽·····</b>	<b>(110)</b>
一、晋杨泉《物理论》中的有关论述·····	(110)
二、晋崔豹《古今注》中的推源·····	(111)

---

三、晋郭璞的右文说门径·····	(111)
四、唐颜师古有据声符推源之例·····	(115)
五、五代徐锴《说文系传》中的端倪·····	(116)
<b>第四章 宋代：语源学转向</b>	
<b>第一节 王安石、陆佃的语源谬论</b> ·····	(121)
一、王安石统以形声为会意·····	(122)
二、陆佃沿袭乃师王氏之说·····	(126)
<b>第二节 右文说的形成与发展</b> ·····	(128)
一、王圣美明确提出右文说·····	(128)
二、右文说的迅速发展·····	(130)
三、右文说的价值与不足·····	(142)
<b>第三节 语转说及声训的流延</b> ·····	(147)
一、戴侗有“一音之转”说·····	(147)
二、郑樵开语转说科学化之先声·····	(148)
三、贾昌朝《群经音辨》中有声训·····	(155)
<b>第五章 明代：语源学合流</b>	
<b>第一节 方以智语源学之功甚巨</b> ·····	(161)
一、首次提出“原”、“推原”概念·····	(162)
二、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推求语源·····	(164)
三、以语源学方法贯通各领域的研究·····	(168)
<b>第二节 李时珍能综合运用语源学方法</b> ·····	(172)
一、以声训方法推源·····	(175)
二、以右文说方法推源·····	(176)
三、以语转说方法推源·····	(178)
<b>第三节 黄生在语源学方法上饶有创新</b> ·····	(180)
一、对前人语源学方法的全面继承·····	(182)

<b>第二节 同源词考释取得了丰硕成果</b> ·····	(331)
一、张舜徽的《说文约注》、《演释名》·····	(331)
二、藤堂明保的《汉字语源辞典》·····	(335)
三、黄永武的《形声多兼会意考》·····	(336)
四、王力的《同源字典》·····	(338)
五、廖海廷的《转语》(《声训词典》)·····	(341)
六、张希峰的《汉语词族丛考》·····	(342)
七、刘钧杰的《同源字典补》·····	(346)
<b>第三节 重要专题的研究亦有突破</b> ·····	(347)
一、联绵词研究·····	(348)
二、流俗语源研究·····	(356)
三、语源学史研究·····	(358)
四、语源义研究·····	(360)
五、语源辞典问题·····	(361)
<b>参考文献</b> ·····	(366)
<b>后    记</b> ·····	(370)